

廣州文物考古集之四

銖積寸累

—— 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廣州文物考古集之四

銖積寸累

—— 廣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選萃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文物出版社

题 签：叶选平

责任印制 陈 杰

责任编辑 王 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0

ISBN 7-5010-1781-6

I. 铢… II. 广… III. 文物－考古－广州市－图集
IV. K872.6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4174 号

铢 积 寸 累

——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21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781-6/K · 941 定价：280.00 元

建所十年 铢积寸累

广州位居祖国大陆南疆，珠江流经城区，各大支流通过五岭山脉可与长江流域相连接，成为广州与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纽带。广州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广州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广州进入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发展阶段。广州城市历经二千多年的沧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发掘、研究和利用工作，是我们文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形势与文物工作的发展需要，1995年5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其前身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专职机构，肩负广州地区的考古发掘、研究和地上文物保护的职能。前辈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开拓了广州考古的新天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着力吸纳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工作上承前启后，在经济迅速发展和旧城改造的新形势下，以做好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为工作重心，配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地铁、内环路等工程，抢救发掘了不少古遗址、古墓葬，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十年来，共发掘墓葬1400余座，发掘遗址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勘探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1994年，德政中路唐代建筑遗址和南汉水涵的发掘，拉开了广州城市考古的序幕。南越国宫苑遗址的发

掘，于1995、1997年两度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标志着广州考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两年在广州大学城工程建设范围清理古墓葬140多座，其中南汉康陵和德陵的发现最为重要，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十年来，广州文物工作者对古遗址、古墓葬进行抢救发掘的同时，对重要文化遗迹的原址保护、展示和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位于老城区中心的南越国王宫遗址，目前考古发掘、整理、保护及展示工作同步进行，并已规划在原址上建设遗址博物馆；南越国大型木构水闸遗址发掘后，保护工作纳入建设单位的计划，经过防腐处理及展示等配套设施后，原址原貌保留在光明广场商业大楼的中庭，成为处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两者关系较成功的个案；广州大学城发现的南汉康陵和德陵、明代古墓及清代炮台原地保护与展示，融入校区的整体规划，增加了校区的文物景点和文化内涵；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原址保护和展示于现代化商业步行街中，文物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宣传；芳村区宋代大通烟雨水井遗迹在民宅小区被用作园林小景，保护与利用得到有机的结合；越秀南路地下排污工程发现宋代城墙，工程沿线改道，遗迹回填保护。

我所除了重视借助传媒进行经常性的文物保护宣传之外，在成立五周年和十周年之际以及广州大学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分别在博物馆举办文物保护展览，

以大量实例向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进行宣传,取得良好的效果。

目前田野考古还未能完全借助先进的仪器在文化层堆积厚达4~5米的遗址上有所作为,考古工作者在高楼林立下开掘探方,栉风沐雨,饥餐渴饮,可谓艰辛;人员编制和室内整理场所受限,令人遗憾;而文物古迹现场保护力量不强,更让人着急。但路还要继续走,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学术理论的支持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引入,也有赖于工作环境的改善,使文物工作者固有的敬业精神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十年建所,铢积寸累。我们从近十年来广州考古出土的数万件(套)文物标本中,根据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选录近300件编辑出版这本图录,奉献给广大读者,籍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发映十年来广州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这些文物也许是敝帚自珍,但确实是广州二千年沧桑的历史见证,弥足可珍,何况它们饱含了广州文物工作者的心血。回顾过去,十年太短,但它是继承前人又开创未来的起点;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广州文物考古集之四《铢积寸累》的出版,将预示着广州的文物考古,在新的形势下,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冯永冠

2005年9月15日

广州十年考古发现与发掘

全洪

广州开展现代田野考古的时间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然而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从1953年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在老城区附近进行古墓葬的抢救发掘和清理,90年代中期,随着广州市经济建设区域的转移,市区的房地产开发,市政建设工程如地铁一号线和内环路等建设项目的开展,对城区内古代城墙、房址、水井等遗存的发掘成为考古工作的另一重心。同时,在广州所属区县,涉及建设开发工程范围内的古遗址、古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也不断增多。

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5年正式成立,专门承担广州地区的文物调查、勘探、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十年来,以城市考古为中心,获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1995、1997年在中山四路北侧发掘的南越国石构陂池和曲流石渠等御苑遗迹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年起,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开始进行全面发掘,这是广州最大规模的主动考古发掘项目。目前已发掘清理出南越国宫殿、廊道、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砖、瓦、石等建筑构件以及木简等珍贵文物。

此外,在老城区范围,还清理了东汉、东晋、南朝、唐、宋、明等各个时期的城墙、道路、房址、水井、作坊、排水系统等遗迹,为研究广州古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对广州古代的城市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旧城区的近郊,尤其是东郊和北郊的太和岗、农林东路、区庄大眼岗、横枝岗等重点古墓葬区,发掘和清理了从南越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朝民国的墓葬逾千座,出土了一大批陶、铜、铁、玉、漆、金、银、石、玻璃玛瑙等质地的器物。

进入21世纪,配合大型建设工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2000~2002年,在从化市吕田镇狮象村、南沙鹿颈村和增城石滩围岭的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存,为建立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材料,对研究南越文化谱系也大有裨益。2003~2004年,配合广州大学城建设对番禺小谷围岛进行的抢救发掘,更是获得了喜人的成果,共清理古墓葬140余座,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掘出南汉康陵和德陵,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下面按时代顺序对广州地区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发掘

作简要介绍。

一、新石器时代与先秦时期

从化吕田狮象遗址 2002年底发掘。该遗址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时期的文化遗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灰坑、柱洞等遗迹。出土双肩石器、有段石铤、梯形石铤、石镞、石环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器形有小口壶、圈足罐、高领罐、圜底釜、节把豆、器座、纺轮等,饰曲折纹、叶脉纹、云雷纹、长方格纹等,装饰手法有拍印、刻划、堆贴。以小口、直颈,圜底下贴泥条矮圈足的罐和壶为代表,与香港涌浪、沙螺湾、广东东莞圆洲、曲江石峡第三期、普宁虎头埔窑址所出遗物相似。狮象遗址位于流溪河上游,地处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山地的过渡地带,对研究几个区域史前文化的交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南沙鹿颈村遗址 位于南沙开发区鹿颈村,2000、200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①。遗址南区有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出土及采集的石、骨器百余件,陶片十余万片,可复原的陶器近百件。石器包括有肩或有段的斧、铤、穿孔石铲、镞、刀、砺石等,陶器的种类和器型较多,以圜底器、圈足器为主,器类有釜、罐、钵、盆、支座等等,纹饰有绳纹、条纹和叶脉纹、方格纹、曲折纹、云雷纹等几何印纹,装饰有拍印、镂空、刻划等技法。石戈、“T”字形环等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此外,发现一座商时期墓葬,随葬陶器4件,保存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鉴定为成年男性,这是在广州地区首次发掘完整的人骨架,为复原3~4千年前“广州人”的形象提供了至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鹿颈村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是广州迄今发现堆积最厚、出土器物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史前遗址,对研究环珠江口区域考古编年和文化面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增城石滩围岭遗址 2000年初发掘。遗址地处广惠高速公路石滩路段,清理商时期和东周时期的灰坑和柱洞等遗迹^②。商时期陶器只见圜底器和圈足器,有大口尊、折腹罐、釜、豆、盘、碗、器座等,纹饰以绳纹居多,还有曲折纹、云雷纹、梯格纹、菱格凸点纹等。另有少量壶、豆等釉陶器,在口沿下穿孔,具有明显的浮滨文化特征。石器有双肩石斧、铤、矛头,穿孔石铤、戈等。围岭遗址商时期的部分陶器纹饰与东莞村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接近,又

吸收了粤东浮滨文化的因素。本次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在灰坑里发现一件商时期的石范，是继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之后又一件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铸铜石范，为岭南青铜时代肇始阶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萝岗遗址群 至今在广州市区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的遗址，而东部的龙洞飞鹅岭、暹岗一带发现多处“夔纹陶”为特征的遗存。1999~2000年，为配合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在萝岗镇萝岗村马隆和龟岗、火村锥林岗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瓮、罐、釜、鼎、豆、盆、钵、杯、器座等硬陶器。纹饰繁多，主要有夔纹、勾连云雷纹、曲折纹、方格纹、菱格纹、重圈纹、旋涡纹、篦点纹、席纹、米字纹及组合纹等。石器有斧、镑、凿、戈等。关于这类遗存的年代，学界有比较接近的认识，大约相当春秋战国时期。

墓葬 2003年在萝岗镇勒竹村园岗京珠国道主干线绕广州公路东环段（简称东二环）发掘一座以石块筑壁的越人墓^③。墓圻为狭长形浅坑，三壁以石块垒筑，北壁设木质挡板，底部铺小石子。出土30余件具有典型特征的越式陶器，有米字纹陶瓮、方格纹罐，还有盒、碗、杯等原始青釉瓷器。稍大件器物有刻划符号。推断该墓是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的越人墓。这种石椁墓是广州考古50年来的首次发现。

二、秦汉时期

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1975年在中山四路清理出2座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后经钻探得知为3座）的造船台及木料加工场地。在造船遗址之上，还揭出一段用大型砖石铺砌的南越国官署走道^④。1994年在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大院对秦造船遗址再次进行发掘，结果验证了1975年钻探的准确，由北向南有三个造船台，有枕木、横阵、滑板和墩木^⑤。1997年在南部又清理出加工场地。关于中山四路的秦造船遗址，自发现之时起就有不同意见，近年来大面积发掘南越官署遗址后，又有人认为是建筑遗址，而且是干栏式的宫殿建筑^⑥。一系列发掘表明，船台所处的位置是当时珠江岸边，今中山四路西段和中山五路、北京路一带是河汉，已被众多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造船台废弃之后，南越国为建造御苑，在其上堆填一层山岗土，覆盖了整个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场地^⑦。

南越国御苑和宫殿遗址 1995~1997年，在中山四路西段揭露出由石筑宫池和曲流水渠构成的园林水景、回廊散水、水井等重要遗迹^⑧。宫池的平面略呈长方形，池壁为斜坡斗状，用石板铺砌，坡面呈冰裂纹斗合；池底以河卵石与碎石平铺。池壁石板上发现“蕃”等刻字。这是岭南

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在南壁底有一条方形木质导水暗槽与石砌曲渠相通。曲渠在宫池的西南面，其基本走向由北而南，急转向东连接一弯月形石池，再蜿蜒西去，长逾150米。1996年清理的一口砖砌水井，以扇形砖筑壁，井底平铺5块经修琢的石板，并开凿泉眼，其下铺细沙。井底发现木轱辘和汲水铁罐，并有大量砖、瓦、瓦当、火烧木构件、石构件等，表明该井是南越国被灭时毁坏的，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军“攻败越人，纵火烧城”的情形。

遗址出土大量砖、瓦、石质的建筑材料和构件。砖有方形和长方形等形制，多数饰几何图案。瓦件主要是筒瓦、板瓦和一种罕见的折腰瓦。大量的砖瓦之中，有不少职官陶文，表明南越国所设的百官与秦汉王朝相仿。瓦当可分为图案瓦当和“万岁”文字瓦当。出土秦至汉初的半两钱和文帝四铢半两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鎏金四铢半两，不仅是广东首次发现，在全国考古发掘中也极为罕见。

2000年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联合组队对原儿童公园范围进行发掘^⑨。揭露出南越国1、2号宫殿基址局部及宫殿内的排水设施。1号宫殿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7米。2号宫殿位于1号宫殿的西南面，仅揭开东南一角，在其上面发现一块戳印“华音宫”的陶器残片。另外还在南越国的地层中发现一块戳印“未央”二字的陶器残片。据此推测南越国官署内可能有“未央宫”和“华音宫”。在1、2号宫殿之间，有一条与之垂直的廊道，廊道南端连接一条砌筑非常考究的砖石走道。廊道的西侧已揭出一段40余米长、铺砌印花方砖的散水遗迹，砖下铺砌木质暗槽，南端有一石质地漏。廊道东侧是一条用陶质弧形凹槽砌成的明沟，南端接一石质地漏。在发掘区内发现多处这类地漏和暗渠，表明整个宫殿内明沟暗渠纵横交错，具有科学的排水系统。

更重要的是2004年底在一口古井中挖出一批木简，为岭南考古史上首次发现^⑩。木简共100多枚，大多数单行书写，墨书隶体。目前所知字数最多的有23字，最少的3字。简文中有职官、地名、法律文书等内容，还有动物、植物的记录。如编号91号的木简简文：“□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七月属 将常使□□番禺人”。可以确定这是南越王赵佗的纪年。这批木简直接确认了南越国宫苑之所在，再加上明确的纪年，彰显出南越国官署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证明了考古发掘工作对该遗址定性定位的准确，并为南越考古的分期断代树立了新的标尺。

南越国还有一处重要遗迹，即2000年在西湖路南侧光

明广场工地清理的水闸遗址^⑩。木构水闸南北向,距地表约4米。全部用木材构筑而成,平面布局大致呈“Ⅱ”形状,由闸室及两岸连接建筑物构成,闸室由侧墙、闸门及闸槽、溢流堰及防渗墙体等组成。闸门位于闸室的中部,宽约5米,两侧方柱由上至下凿有凹槽,槽口宽约10、深12厘米,用于插板闸水。子母口闸板相叠利于吻合成整体,可启闭,可装卸,这种控制水闸的汇流技术,在当时已是十分成熟、高超。闸室的底部用方木或圆木组成矩形框架基座,以承托闸室。其结构和功能与近现代的极为相似,为研究中国水利史,了解古代建闸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水闸遗址在原址保护。

墓葬 东山发现的两座南越大墓非常引人瞩目,1997年在农林上路四横路发掘一座带墓道长方形分室木椁墓,结构完整,椁室内分棺室、后室和器物架^⑪。出土漆、木、陶器等430多件,以车、船、牛、马、人物等表现出行、宴飨、炊煮、仓储等场面的木制模型,是研究南越国时期生活形式的实物例证。2003年又在其东边不远的农林东路发掘一座大型人字顶木椁墓^⑫。全长15.5米,墓坑宽8.8米,竖穴墓坑平面略呈“凸”字形,由墓道、前室和主室三部分构成。从盗余的情况看似为单棺,棺由上下两块独木制成,髹黑漆。因墓已遭盗扰,遗物较少,出土一袭髹漆皮甲,经整理,可认定为目前国内秦汉时期首例可修复实用皮甲,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此墓是目前岭南秦汉规模最大的木椁墓,为研究南越考古增添新的资料。

执信中学、太和岗和农林东路猫儿岗等地都发现一批典型越人墓。猫儿岗的越墓坑穴狭长,在头部或足端设小龕,与湖南长沙和资兴等地的越人墓相似。1999年在先烈南路大宝岗清理的一座小型木椁墓^⑬,随葬器物有蒜口瓶、盃、鼎、釜、盆、勺、带钩等铜器以及铁剑、陶甗、陶罐等10多件,铜器的数量比陶器还要多,在西汉早期小型墓中较为鲜见。发掘资料表明,南越国时期的越人墓多在城郊的北面和东面,珠江南岸至今未见。近年又在广州市区东部华侨新村、建设新村、先烈路、区庄和东山等地发现一批,为研究广州秦汉时期越人墓的分布和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广州市东郊发现西汉中晚期墓葬较多。横枝岗1号远东风扇厂、广州市胸科医院、恒福路银行疗养院、麓湖路南方电视台、永福路干休所等工地发现数十座,在珠江南岸的内环路南田路段也清理了3座。这批墓葬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木椁墓,随葬器物丰富。1996年横枝岗1号工地发掘西汉中晚期墓8座,出土一批铜器,以滑石鼎、壶、钫、敦、簋等具有特色。1997年广州市胸科医院工地清理3座,

2座为长方形竖穴木椁墓,1座为横前堂木椁墓,出土文物110多件^⑭。2000年恒福路银行疗养院工地发掘的M2是该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由墓道、封门、横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放置木箱3个,其中一个大箱内放置木车马模型;另两个木箱分置仓、灶等明器和陶烤炉等。后室边箱及棺内清出丝质面罩、玉具剑、玉带钩、错金银柄铜削、铜博山炉、铜鼎、铜钫、铜壶、玻璃器等。

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其中有部分属新莽时期的)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的一大收获。墓葬形制为竖穴长方形分室木椁墓。番禺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建设工地清理了33座,在先烈南路大宝岗、梅花村65号省委宿舍楼、永福路南圣岗住楼^⑮、执信中学大眼岗、麓湖路南方电视台等工地也有发现。这些墓葬有相当一部分出新莽的“大泉五十”铜钱以及新莽和东汉早期流行的规矩镜。1997年梅花村出土成套的银手镯、银串饰和银指环,非常少见。另外这个时期的陶雁形盒、铜鸠杖首造型别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永福路、执信中学大眼岗、番禺小谷围岛青岗等地还清理了土坑木椁墓向砖室墓过渡的砖木合构墓。根据墓葬形制和器物分析,大体可定在东汉早中期。

东汉晚期墓葬的数量更多,分布的地域更广。2003~2004年,在广州大学城(小谷围岛)发掘东汉砖室墓88座。按墓室结构可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按平面有长方形、“凸”字形、“中”字形、“T”字形、“十”字形、“串”字形和“井”字形等多种。北亭村山坟头岗M1平面大致呈“井”字形,为两座并列的“串”字形多室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和耳室组成,两墓耳室相通,形成过道,属典型的同坟异穴合葬墓^⑯。东西通长15.5米,南北通宽15米,出土陶罐、尊、壶、灯、器盖、豆、井、俑像及铜钱、铜泡、铜扣、银环、玛瑙珠等共72件。该墓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共四个穹隆顶,既是目前广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东汉砖室墓,也是广东罕见的纵向并列式多室墓。

1998年在番禺钟村屏山二村发掘的15座砖室墓,有一批双穹隆顶的多室墓的形制结构与广州市郊的有所不同^⑰。屏山汉墓出土刻划或书写铭文和符号的墓砖600余块,有姓氏、人名、官职、地名、年号、吉语、数字、符号等。村头岗M1的“番禺都亭长陈诵”刻字墓砖,具有初期墓志的意义。同墓并出“永元十五年”(103)的纪年铭文砖。此外,还有“永初五年九月”等纪年砖。该墓地刻文墓砖数量如此之多,在广东尚属首次发现,其本身所寓意的丧葬习俗很值得思考。2000年广惠高速公路增城石

滩围岭和三江岗尾段发掘15座东汉墓。围岭M10一块砖上刻有“永平十年正月……”。即公元67年,是目前广州已知最早的东汉纪年砖墓。内环路恒福路段出“永元九年甘溪造万岁富昌”字砖;东山中山一路出一件残断铜环首刀,阴刻“阳嘉二年九[月]……”。“阳嘉二年”为汉顺帝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33年。这批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为判断广州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提供确切的依据,也会为东汉中期墓的细分提供可能。此外,在东山梅花村、先烈南路大宝岗、先烈中路黄花岗、执信中学大眼岗、中山一路以及番禺南村三把岗等地东汉墓里出土大量陶城堡、陶船模、车模、陶抱婴俑、陶镇墓兽、铜镜、铜狮子等珍贵文物。

城墙 为配合地铁及地铁上盖物业地块基本建设,1996、1998年,在中山五路JY-1地块两次进行发掘,揭露出一截南北走向的墙垣。该城墙始建于东汉,晋代扩建,南朝再扩建。初步推断为汉晋广州城的西墙。这段城墙三期修建的地层关系明确,对研究广州城市发展、城墙位置沿革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窑址 海幢寺窑址是第一次发掘的汉代窑场^⑧。窑址位于珠江南岸同福路,仅发现以陶瓮罐排列堆砌的遗迹。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其种类几乎包括了能在汉墓中所见到的生活器具,另有模型器、陶塑和建筑材料等。遗物与广州汉墓出土的造型、纹饰、烧制工艺都十分相似,推断该窑场烧造时期大约是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后期。

三、三国晋南朝时期

窖藏 广州三国考古的重大收获是2000年底在广百新翼工地发现一处窖藏^⑨,下层是陶瓷器和筒瓦、板瓦和砖块等,上部堆置成串铜钱。可辨识的钱币有“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五百”、“大泉二千”、“大泉当千”等。“大泉五百”铸于三国孙吴嘉禾五年(236)是东吴自铸货币最早的一种。“大泉当千”铸于赤乌元年(238)。“大泉二千”,史志不载。这次发现三国铜钱的数量之多不仅是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在岭南地区亦属少见,同时也是首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三国遗物,一些陶器、青瓷器将为认识广州汉末至晋代的考古材料提供线索。

墓葬 在太和岗、黄花岗、大眼岗等地发现一种既异于东汉墓,又有别于晋代的墓葬,据类型学推测可能为三国时期。2002年永福路清理的2座,墓室呈长条形,前后不分室,多数为半截砖或残砖,墓壁和底砖铺砌随意。出有钵、碗、碟、小罐、盂、砚台等青釉陶器,另外还有陶四耳罐、水田模型、滑石猪、残漆盒和简化规矩铜镜等。其特点是随葬器物以青釉瓷器为多,虽然釉已多脱落,但其釉色青绿,有玻璃质,与东汉的质薄酱褐色釉明显不同。然

而,目前在广州地区尚未见绝对纪年的三国墓可资比较,其推论是否准确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近十年来,晋南朝时期墓葬发掘不少。麓湖路南方电视台工地一座东晋券顶砖室墓。墓壁砖上刻有“太宁二年甲申宜子孙”、“大兴一年八月”二个年号,分别为公元324年和318年。制砖年代确凿,为晋墓提供了准确的断代依据。2000年恒福路省人行疗养院清理的一座东晋砖室墓,以青灰砖单隅错缝结砌,由墓道、甬道、横前室和后室组成,券顶保存较完整。已被盗,随葬品只余罐、碗、多子盒等7件。1998年永福路永福大厦清理南朝墓1座,分前、后室,保存较好,唯封门在发现时受破坏。室内设衬拱,前室的两侧壁砌有直棂假窗。祭台左上方壁上有一枚铁钉,可能与帷帐有关。1999年东山农林下路四横路工地,共发现10座南朝墓,分布比较密集,清理其中7座。四座规模较大,结构相近,砖厚重,面拍印纹饰。室内设祭台,侧壁砌直棂假窗、牙角等装饰。因破坏较为严重,出土遗物不多。这是近年来广州发现的一处分布比较密集的南朝家族墓地。1997年,在增城市荔城镇西山村岭尾山发掘了3座南朝砖室墓。M1规模较大,砌筑工整讲究。有封门,由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四部分组成,青灰砖砌多重券拱。M2破坏严重,以厚重红黄色砖结砌,有后室、过道、前室和壁龛。出土有青釉鸡首壶、四耳罐、碗、盆、盘、砚和酱釉直身罐、滑石猪等。墓葬形制、结构、砖材以及随葬器物与广州同类同期墓很近似。

最重要的南朝墓当属广州市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工地的两座^⑩。都是长方形券顶砖室墓,斜坡式墓道,有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墓壁两侧砌直棂假窗和菱角牙子等装饰。后壁用切角砖砌筑假柱。随葬青釉瓷器和滑石猪、铜钱等。二墓相邻,墓向一致,用砖、砌筑方法及出土器物风格均非常相似,应属同一时期的家族墓地。M69墓道北端上部砌有方形砖函,内置滑石买地券一方。据买地券可知,该墓主人葬于元嘉二十七年,即公元450年,属南朝早期。这是广州五十年来首次发现明确纪年的南朝墓葬,为广州地区南朝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材料。买地券的文字格式和内容以及滑石符篆都带有强烈的道教色彩,为研究早期道教传入岭南地区提供了物证。

城墙 位于中山五路的三期城墙,东晋时对东汉墙体扩宽、加固,以砖包边。有的砖模印“泰元十一年……”。为筑墙时间提供断代依据。南朝的城墙在汉、晋的基础上再扩宽,墙壁也包砖,在西侧还发现一处马面结构。

四、隋唐五代

墓葬 广州迄今没有正式发现有纪年的隋代文物,因

而对断定隋墓带来一定困难。1999年福今路广东省气象局大院内发掘一座结构具有南朝墓和初唐墓的风格和特征,与广东封开县封川隋墓的形制较为接近,故暂定为隋墓。

广州发现唐代的墓葬相对少于汉、晋南朝,年代明确的也少。1998年永福路37号工地发掘唐墓2座,其中一座砖面模印草花纹图案,在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初步推测为唐代前期墓。1999年福今路2座唐墓出土的瓷执壶、瓷罐、瓷碗均施半釉,应属唐代初期。晚期唐墓较多,在淘金坑淘金花园工地,1998年底发掘晚唐墓葬4座^②。M2出土的一方砖质墓志,墓主为广州同节度副使王复元,山西太原人,瘞于唐开成五年(840)。M3也有一合墓志,朱红墨书写,已浸泐不清。1998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内清理的1座唐墓,所出陶俑为以往发掘唐墓较为少见^③。动物园北先烈中路的两侧共发掘晚唐墓12座;淘金坑珠江房地产公司工地清理晚唐墓3座,在这两处墓地经正式发掘出土几件端溪紫石砚较为重要。2000年恒福路银行疗养院清理出7座唐代砖室墓,其中一座长方形竖穴叠涩顶,出土八菱团花铜镜。一座土坑墓,在墓圻中填积木炭和石块,坑壁开有10个壁龛,出土开元通宝铜钱、陶瓮、小罐等,一方石质买地券,刻划的文字多漫泐不清。

执信中学大眼岗清理隋唐墓36座^④,皆为砖室墓,仅一座土坑墓,有长方形券顶、凸字形券顶、长方形带耳室、长方形双室、长方形单室叠涩顶等。这批墓葬上承南朝,下启北宋,大体反映了广州隋唐墓的形制结构。隋至初唐墓砌墓用砖的规格、颜色与南朝墓基本相同,但墓砖多为素面,红皮黑心,火候较高。墓室狭长,保留有南朝墓特点,出现了前后室之间以多层台阶相连,以及后壁下部用弧形砖砌成壶门等新形式。中晚唐墓多用灰黑色小砖砌筑,墓前近封门处设方形小渗井,后筑棺床,棺床前有耳室,两侧壁及后壁有多个小龛。2004年永福路干休所工地清理一座红砖结砌,前、后室之间有砖砌多级阶梯相连,两侧壁砌龛的残墓^⑤,出土一面葡萄蔓枝纹铜镜,这类镜主要流行于盛唐及中唐,是可靠的断代依据。通过这座小墓,大致可以推断素面红砖墓的下限到盛唐,红砖与灰黑小薄砖的分野可能在中唐。

城墙 2001年西湖路光明广场工地发掘,呈南北向。清理了墙体、壕沟、城内的活动面及位于城墙和壕沟之间的走道^⑥。城墙中间为夯土,东西两侧用砖包边,砖墙底下有基槽。第Ⅰ期城墙上部宽6.25、底部宽7.25、残高1.55~2米。Ⅱ期修筑与Ⅰ期基本相同,向城内(东)侧扩展。壕沟位于墙体以西约3米处,与墙体平行,有大小不一石块护坡,坡面平整。墙址的层位及夯土层内发现的

铜钱为判断城墙的年代提供准确依据。“乾元重宝”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铸行,“开元通宝”背刻“掐文”,具有中晚唐时期的特点。而城墙又被3个介于唐末到北宋的礮墩打破。据此,可推断城墙修建时间上限不早于公元758年,使用时间应在唐中晚期,至唐末五代,刘隐、刘岩平禺山,凿西湖,扩建广州城,同时也推平了城墙。1998年在越华路银山大厦附楼工地发现一段南北向的夯筑土城墙,也有石护坡。可能是东城墙。

铸币遗址 位于西湖路广百新翼工地,2000年发掘。初步推断为唐代前期,出土一批“开元通宝”铜钱,有成品和次品,还发现不少冶铸残余的铜块、铜叶、浇铜槽的铜枝和坩埚、铜渣、炭块、焦土粒等。铸钱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岭南道的政治、经济、钱币史和铸造工艺提供珍贵资料。

房基与道路 1999年地铁二号线公园前站发掘,唐宋房屋比较密集,发现大量的礮墩、沟槽遗迹及砖瓦等建筑材料。有一口水井,为南朝砖井,唐代继续使用后废弃,井内所出全部是唐代遗物,有50多件陶罐,还有莲花瓦当、双唇瓦、鬼面瓦、筒瓦和开元通宝钱。

北京路在各历史时期有不同名称,发掘表明自唐代开始就成为广州古城的中轴线。2002年的发掘共发现11层古街道路面,其建造年代涉及民国、明代、宋代、南汉、唐代等五个历史时期^⑦。唐代第一期、第二期道路路面平整,平铺一层细石子及零星碎砖。下垫灰沙土,土质紧密。第三期道路路面以青灰砖东西向平铺,路面西边有排水沟。

南汉宫殿与建筑遗址 南汉政权在兴王府(广州)大造宫殿,宫苑区在今中山四路。1997年发掘南越国御苑时,发现南汉的石山莲池,筑有木构堤岸,以英石堆砌,出土大量青釉琉璃瓦等建筑构件和乾元重宝钱。2000年在儿童公园内发掘出南汉殿堂建筑,其中一座宫殿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其礮墩之大,在我国建筑史上十分罕见。2002年其南部发现宫殿建筑的石板铺地面,用青石打磨而成,表面非常光滑。在此宫殿南边,中山四路316号门前发现一个特大型石柱础,雕刻16只狮子,在石础周边还发现石板铺地面及青釉琉璃瓦乾元重宝铅钱,如此巨大的柱础,可以想见当日宫殿规模之宏大。2003年在中山四路南侧、文德北路西侧,发现了南汉时期大型建筑群落,包括大型礮墩建筑基址、砖铺走道、广场和八角形建筑基址^⑧。初步认为该建筑群落与南汉皇宫区域的建筑有密切关系,不排除是皇宫区域的组成部分。莲花瓦当有高温青釉陶或低温绿釉陶。兽面瓦当和双凤瓦当、联珠纹垂花边滴水瓦等均为高温青釉。鬼脸瓦、脊瓦饰、鸱尾等建筑构件,充分显示

了南汉皇宫建筑的华丽和建筑工艺水平的高超,文献记载的“玉堂珠殿”可见一斑。

在广州城北和城南远郊还分别发现两处重要遗迹。2004年在麓湖路南方电视台工地发现的建筑基址,有庭院、廊道、散水、房基和房屋隔墙。始建于南汉,北宋时期又进行过重修。在废弃的瓦片堆积中有大量莲花瓦当,还发现鸱吻和鬼脸瓦等,表明该建筑非一般民宅。一个灰坑堆满贝壳和泥土,出土大量生活用品,有青釉碗、青釉碟、宽沿夹砂黑陶釜、青釉执壶,以及南汉“乾亨重宝”铅钱。弥足珍贵的是坑内出土一件青铜铸像。这是首次在市心以外发掘南汉建筑遗迹。据文献和建筑的方位分析,此处建筑遗址可能与南汉甘泉苑及其附属建筑或二十八寺中东、北面的寺院有关。此外在芳村大道还清理了南汉—北宋建筑遗址和宋井一口^⑨。南汉建筑基址的礅墩规模较大,建筑材料丰富,有莲花纹、凤纹瓦当。从瓦当、滴水 and 铺地方砖上施釉等情况反映了此处建筑的规格较高。在本次发掘中,还出土了自报家门的珍贵文物,在几件北宋年间的青瓷碗底发现多款墨书“大通”二字的铭记。经分析研究,是南汉宝光寺和宋代大通寺的“烟雨井”遗址。

南汉二陵 2003~2004年在番禺小谷围岛北亭村发掘。康陵位于大香山南坡,南北向营建,地面建有陵园和陵台,地下筑玄宫。以居于园内中部偏北的方座圆丘陵台为主,四周有夯土墙垣包围,形成陵园。垣墙四角筑有角阙。南墙正中为开园门,门外为廊式(献殿?)建筑。陵台由圆台、方座、散水等分层构成,南侧有神龛、祭台和坡道。地宫筑在陵台正下方,为长方形多重券顶砖室结构,由墓道、封门、甬道(门洞)、前室、中室和主室组成。因盗扰严重,仅残余破碎的陶瓷器、玻璃器、铜钱等。在前室当门横立一块完整的石哀册文,可确认墓主为南汉高祖刘岩。刘岩死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同年九月“迁神于康陵”。

德陵位于青岗北坡,当地人称为“刘王冢”。该墓遭严重破坏,墓室内的陪葬器物无存,后壁及两侧壁龛均遭破坏,铺底砖全被撬起。墓葬由墓道、封门、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坐南朝北。墓道南端有一砖砌的器物箱,内置青瓷罐190件,釉陶罐82件,共计272件,应是当时“墓前设奠”之遗留。

小谷围发掘的二陵,是五代南汉国的标志性史迹,又是目前已知五代十国的陵墓中首次发现的陵园建筑,其营建形式特别,圆丘形陵台形制独特,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为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实例。康陵哀册文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哀册文碑石,其内容有的可与南汉史及

广州现存的南汉遗迹相印证。德陵墓道器物箱出土一批青瓷罐,是五代青瓷的珍品。其中素胎无釉的木瓜、菠萝、香蕉、马蹄、茨菇、桃、柿等象生祭品,是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蔬果类象生陶瓷制品,可为中国陶瓷史增添一笔。外国玻璃制品,对研究古代玻璃和对外贸易交通具有重要价值。南汉二陵已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宋代

宋代城市考古的内容颇为丰富,城内有城墙、房址、水系等,城外有码头,在远郊还有村落和窑址。由于唐宋以后盛行火葬,因而埋葬形式以骨灰坛(魂瓶)为主,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很少。

城墙 经过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对宋代的城墙的范围及轮廓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广州宋代有三城,即子城、东城和西城。采集到一块模印“广州三城”的修城砖,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在两宋三百多年间(960~1279年),广州的城垣扩建修葺了十余次之多,而在北宋期间扩建最大。重要的有庆历四年(1045)加筑子城(即中城)、熙宁初(1070)修筑东城、次年修筑西城。考古发现的宋城遗迹,以东城和子城的发现较多,子城有北界(越华路)、子城与西城之间的内墙(广仁路),子城的内城门(中山五路)、双门鼓楼(北京路);东城东界(旧仓巷)、东城北界(越秀路)、东城东门(越秀中路)。

1996年底,在仓边路与越华路交汇处的银山大厦工地发掘出早、晚二期宋代城墙,东西向,夯土墙用砖或条石筑壁包边^⑩。墙体填土中出土大量宋代陶瓷器,早期砖有拍印“番禺修城大条砖”、“广州修城砖”、“南海修城砖”;晚期有一块“景德元年造御备砖”,为断定城墙的年代提供准确依据。1998年春向西发掘,同样发现以砖包边的夯土墙,其西端直接依筑于唐土墙之上。今越华路沿线的城墙是东城和子城的北墙。2002年越秀北路东濠涌截污工程清理出宋代东城城墙遗址和明代东门基址,确认了宋东城城墙的位置,从而纠正了明清以来方志关于宋东城不过芳草街的误断。1997年吉祥路吉祥大厦工地宋代“六脉渠”附近发现子城与西城之间的一座城门(可能是文献所记的有年门)。如今宋代城墙的子城的北、东、西界,东城的东、西、北界基本可以确定,广州宋三城的几处关键方位大概已经由点到线可以串联起来。但是,西城的西界及三城的南界仍不清楚。

房基、道路等 1999年中山四路府学西发现宋代房屋建筑基址2座。有砖砌墙基、砖铺散水、夯土台面和大型礅墩等结构。出土大量青灰色板瓦、筒瓦、瓦当残片和陶瓷片。地铁二号线公园前站工地发现分布密集的房屋。西

湖路光明广场也发现宋代的砖砌房址、道路、散水等遗迹。中山四路儿童公园内清理了宋代院落遗址三处，为三进格局，主体建筑前面有庭院，东西两侧为附属建筑，形成中轴对称的大型院落，还有保存较好的排水设施。

在城里，除了房基外，还发现不少灰坑。府学西路一个灰坑出土一批精致的瓷器，以青瓷和白瓷为主。模印莲花瓣鼓腹带盖青瓷小盂数量众多；白瓷器器形较小，有小罐、盂、瓶、杯、粉盒等。这类瓷器在以往发掘中极为少见。麓湖路南方电视台工地在建筑基址西侧有一个长方形小窖藏坑，放置青瓷执壶、黄绿釉执壶、黄绿釉盒、黄绿釉盆等9件陶瓷器，可能与建筑废弃有关，是广州首次发现宋代瓷器窖藏。

北京路千年古道的宋代道路共有四期，路面呈中间高、两侧低的弧形，用青灰砖或灰白色砂岩石板铺成。路面下发现排水暗沟。宋代的建筑基址分二期，第一期有大型礫墩、建筑基址北边的砖铺散水、散水以北的砖铺路面、建筑基址南端的外包砖墙、建筑基址南边的斜坡漫道。宋代第二期建筑基址有砖铺门洞地面、石门槛、门枕石，北接砖铺路面。初步判断属文献记载延续千年的古门楼基址。

2002年中山六路北侧黄金广场建设工地清理出东汉、晋南朝、唐、两宋及明清各时期文化层^⑨。两宋时期文化层堆积最厚，遗物也最为丰富，包括青瓷、青白瓷、白瓷、绿釉瓷、青釉器、黑釉器、釉陶器及瓦当等。这是在西城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发掘。

2004年在珠江南岸与花地河夹角台地，发现一处南汉和北宋的建筑基址及水井一口^⑩。北宋建筑基址填垫的瓦砾层出土较多的南汉时期的建筑材料，还有几件青白瓷碗，在碗的外底用墨楷书“大通”二字铭款，是宋大通寺遗址的实物证据。宝光寺初为广州南汉的南七寺之一，宋代改称大通寺。在寺院内发掘出水井一口，由13个石圈叠砌而成，这种考究的构筑方法在广州目前所发现的古井中极为少见。据载每当晨曦初散，井口周围轻烟袅袅，故称“烟雨井”。大通寺面向白鹅潭，背靠大通港，“大通烟雨”是宋、元时期的羊城八景之一。

河渠、堤坝 广州城自宋代开始修建城市河渠，采自白云山南流水源的饮用供水和排水系统称六脉渠。明清沿用，但渠道略有不同。1997年在吉祥大厦工地，发掘出一段长9米的宋代“六脉渠”，呈南北走向，两壁用红砂岩和灰白砂岩石条砌筑。渠底用横木支撑两壁的墙基。在地铁一号线中山五路与教育路交汇处工地，距地表5米深处发现大型木桩板护岸堤坝。堤坝东侧为地势稍高的山冈，西边的地势低洼。从地望推测，为宋代西湖堤坝遗址。

在宋代东城范围内，中山四路南侧的大塘街清理了一段东濠堤坝遗址^⑪。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堤坝已知宽14~17米，高0.6~2.5米，分两期修筑。第1期堤坝以棕红色亚粘质山岗土堆填而成，西侧临河面筑有木挡板结构，河滩上还布满河卵石、碎石、残砖、瓦渣等。Ⅱ期附筑于1期堤坝西侧，用普通青灰砖砌成护壁，绝大部分为残碎砖，外侧用木桩加固。堤坝上有一条灰褐土与贝壳夯成的路面。堤坝西部为河道淤积堆积，厚约1.2米，出土大量宋代青瓷、青白瓷和釉陶器。据广州旧方志和文献可以推知，此处水流为北宋的东濠。东濠北段称文溪，岸边曾是宋代的盐仓，往南通向珠江。

墓葬 恒福路银行疗养院发掘1座小型竖穴土坑墓，随葬北宋哲宗纪年铜钱和点绘黑彩菊花纹陶盅1件。

小谷围南亭村小陵山和贝岗村清明岗清理的几座宋墓，是广州宋代考古的重要资料。小陵山为一处家族墓地，有4座^⑫。墓葬分地面坟茔和地下墓穴两部分。坟前砌筑砖石祭台，石槨的外侧雕刻动物、植物等花纹。M1坟茔坑南边墓道口处理有一对魂瓶。小陵山M2出土一对带盖青瓷罐、M4的1件菱花形铜镜，背面铸“湖州真石三十□家照子”。据陶魂瓶和“湖州镜”初步推断这些墓的年代为北宋晚期。

2003年华侨新村华侨小学发掘1座宋墓^⑬，为砖砌墓壁，内置二棺，棺外封石灰，当为夫妇合葬墓。在二棺的四周排列石雕俑像和石狮36个。石俑立姿，头顶小圆帽，有的卷发长辫。石雕俑像为广州考古首例出土。据随葬的端石抄手砚、青白瓷葵口碟、陶魂瓶等推断是为南宋墓。

六、明清

西城门瓮城遗址 明洪武年间把宋代三城连作一城，形成现在广州老城区的格局。明《广州府城郭图》记当时城墙共开七个城门，1996和1998年，在中山七路与人民北路交界处清理了明西城门瓮城遗址^⑭。墙体用红砂岩石包边，墙芯以黄褐色土夯实。经清代和民国沿用、修整。这是迄今广州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城门遗址。

六脉渠 1996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山五路与越华路，在同一直线上的南北两个地点各清理了一段以红砂岩砌筑的石渠。这两段石渠的构筑形式及渠内的堆积情形都基本相同，渠壁用红砂岩横、纵层叠结砌，两壁较直。渠底以碎砖瓦、小石头平铺，面上垫一层粗砂。渠内出土大量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中山五路的渠底还发现一袭残铁铠甲。石渠的东壁有一块砌石，上刻“左卫前所”四字。都司卫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据此可以断定，石渠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明代。从位置上推测，当系明清六脉渠“左

一脉”的一段。在两段石渠之间的华宁里，为清代“七块石”之所在，因此I段石渠的收窄处，应是署前渠上清风桥的桥墩。明清两代的文献和方志对六脉渠及其使用和修浚多有记载，渠内出土遗物反映了清乾隆以后的多次修整。

墓葬 在番禺区南村茅山岗发掘明代中晚期家族墓地^⑨。墓葬由地面建筑和地下墓室构成，地面建筑已遭破坏，残存有红砂岩石条砌成的台阶与祭台，红砂岩石狮、怪兽、卷云纹三角形碑冠、石屋脊模型等构件。祭台下面有两座同穴双室合葬墓，有墓志或买地券，M2墓主生于景泰乙亥年（1455），终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享寿92岁。M1墓主生于弘治七年（1497），终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M2女主人头戴金质如意形牡丹和凤鸟束发冠和葫芦形耳坠，是广州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其精美程度可与南京等地的贵族墓出土的媲美。

番禺小谷围南亭村金银山南坡清理的1座石人石马墓，墓地范围长约50米，宽约20米，神道、祭台、坟圈三级次递增高。神道两侧立有三对石人、石马、石羊，祭台和坟圈以砂岩石板铺砌。根据残存的墓碑，确知该墓为夫妻合葬，墓主姓曾，名豫斋，赐进士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葬于明万历十八年。墓葬的地面建筑全部用石材砌筑，虽然遭到破坏，部分构件倒塌、离散，但其结构完备，形制规范，其石构件琢刻精美，六尊石俑齐备，保存完好，为广州地区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石砌山手形明代墓葬。

清代炮台基址 位于小谷围岛西北部的穗石村。十五个炮台基座东西向面朝珠江呈弧形依次排列。略呈南北向，向东圆弧。占地南北长80、东西宽50米。基座平面形状为等腰梯形，正面及左侧各有一个小龛。内侧两立面有放置炮弹和藏身避弹的内龛。有几座发现二次加筑痕迹。炮台基座大小不一，由于损毁严重，顶部已塌。基座用三和土夯筑而成，基座底部较平，底部放置几根木条作固定。经发掘未发现有任何房基及柱洞，遗物极少。据其材质及形制结构等综合文献分析，可能是清代早期的炮台。穗石村炮台群遗址为广州地区现存较早期的海防炮台，对于研究海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综观近十年来的广州考古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是南越国、两汉时期的考古材料进一步丰富，有力地推动了对南越国和广州地区两汉历史研究的深入，而六朝、唐宋时期的考古材料也得到充实；另一方面，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时空范围更加广泛，考古工作不

再局限于广州城区附近，在远郊及区县（市）也进行了系列发掘。在材料方面，不仅有历史时期众多的古墓葬，而且延伸到先秦文化遗存，历史时期的城墙、房址、道路等建筑遗迹，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领域，推动研究工作的广泛和深入。可以说，近十年的广州考古已发展成古墓葬抢救发掘、城区考古发掘研究、远古文化探源三线并进的新局面。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广州的考古工作仍将以城市考古为中心，以南越国和南汉史迹的发掘和研究为重点，将来广州地区还会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为广州城建史、广州地区历史文化以至岭南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材料。

注释

- ①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沙鹿颈村遗址的发掘》，《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年。
- ②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城石滩围岭遗址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③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萝岗元岗山越人墓》，《广州文博》2005年第1期。
- ④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 ⑤ 广州市文化局等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2000年。
- ⑥ 杨鸿勋：《南越王宫殿辨——与“船台”说商榷》（上、下），《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26日、5月3日。
- ⑦ 冯永驱等：《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考辨——兼评杨鸿勋〈南越王宫殿辨〉》，《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26日。
- ⑧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
-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 ⑩ 韩维龙、刘瑞、莫慧旋：《广州出土西汉南越国木简》，《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4日第1版。
- ⑪ 冯永驱：《世界上最早的木构水闸》，《文物天地》2003年第5期。
- ⑫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东山发现西汉南越国大型木椁墓出土大批珍贵漆木器》，《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⑬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⑭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汉至晋南朝墓葬》,《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⑮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横枝岗西汉墓的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
- ⑯ 张金国、全洪、马建国:《广州永福路王莽三国时期墓葬清理纪要》,《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年。
- ⑰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谷围岛山文头岗东汉墓》,《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⑱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博物馆:《广东番禺市屏山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⑲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海幢寺汉代窑场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3年第3期。
- ⑳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西湖路三国钱币窖藏和唐代铸币遗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㉑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南朝墓发掘报告》,《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㉒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太和岗唐代墓群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㉓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 ㉔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信中学隋唐墓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㉕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永福路汉唐墓葬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㉖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西湖路光明广场唐代城墙遗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㉗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的发掘》,《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㉘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四路致美斋南汉与宋代建筑遗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㉙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大通寺遗址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㉚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仓边路发现宋代城墙遗址》,《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㉛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汉六朝唐宋遗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㉜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大通寺遗址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㉝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大塘街宋代河堤遗址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㉞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谷围岛小陵山宋代家族墓》,《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华侨小学南宋墓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㊱ 黄兆强:《广州市明代西城门瓮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
- ㊲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茅山岗明墓发掘报告》,《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廣州文物考古集

葉選平題





目 录

建所十年 铢积寸累 / 冯永驱 / 9

广州十年考古发现与发掘 / 全 洪 / 11

图 版

城市考古篇 / 1

先秦考古篇 / 257

图文检索表 / 302

后 记 / 311



城市考古篇